

我在野寨中学的三位语文老师

杨厚君

近日重读《美文》杂志上汪惠仁先生的《八十年代野中记忆》，文中一段话久久萦绕在我的心头：“谁不想在俗世当中‘成功’呢，从野中出来的孩子也一样有这样的想法。不同的是，在成功学之外，从野中出来的孩子有着自己特别的志向与趣味。”读到这里，我内心感触万千。文中所说的“野中”，便是潜山市野寨中学。我也是野寨中学的孩子，惠仁君的文字，像一把钥匙，一下子打开了我封存多年的高中记忆，那些泛黄的少年时光，校园里的一草一木，讲台之上师长们的音容笑貌，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我是1979年进入野寨中学读书，1981年毕业。高一阶段，我的语文授课老师是孙昌瑞先生，升入高二之后，则由汪南松先生接手我们的语文教学。还有一位虽没有直接给我授课，却深刻影响我后期写作与思考的老师——方雄飞老师，彼时他在校负责高二年级的语文教学。

方雄飞老师一身传统文人儒雅气质，平日严肃不苟。在校两年，我常常与他擦肩而过，心里渴望上前问好，却心怀怯意，只能远远观望，不曾深入交流。

真正与方雄飞老师产生交集，是我1988年研究生毕业之后。彼时方老师已经退休，居住在安庆市老年公寓，但他并没有就此安享清闲，依旧笔耕不辍，承担着《集体经济之友》杂志的编辑工作。刚参加工作的我，就职于芜湖市政府，日常工作大多和经济领域相关，在工作实践之中，慢慢积累了不少对于经济工作的思考。一次从芜湖返乡，途经安庆，偶遇孙昌瑞先生，我便和他聊起自己对经济领域的诸多想法。孙先生听完十分认可，鼓励我把这些思考整理成文，还向我推荐了方雄飞老师。

我第一次登门拜访方先生，就在安庆老年公寓。和方老师同住一室的，是一位退休干部，此人不抽烟，也十分反感旁人在屋内抽烟。可方老师烟瘾很大，为了不打扰室友，接待访客时，他便只能移步阳台。我敲开门，开门见山做了自我介绍，告知是孙昌瑞老师引荐前来。方老师听闻来由，把我领到阳台之上，我递上一支香烟，神色一贯严肃的方老师接过烟的那一刻，脸上紧绷的神情骤然舒展，多了几分随和。可当我把自己撰写的论文递到他手中，他的神情又立刻恢复严谨认真。他先是快速浏览全文，随后又回到文章开头，逐字逐句地为我推敲打磨，指出文稿里逻辑、措辞上的不足，提出修改意见。那个下午，我们从下午两点一直交流到五点，整整三个小时，他毫无保留地指点我，没有半分敷衍。

从那之后，我又数次前往方老师的杂志社办公室，带上自己新写的文章请他指点。1989年，

1990年这两年间，《集体经济之友》先后刊发了我四五篇围绕经济工作思考的论文。

经过多次面对面的相处，我才真正了解方雄飞老师，现实中的他，并不像我学生时代远远观望感受到的那般严肃刻板。他谈吐诙谐幽默，言谈之间常常迸发出富有智慧的金句，和他交流总能收获很多启发。可交往渐深，我也窥见了他的私人生活之中诸多难以言说的坎坷



蓝天下 周文静 摄

与不如意。人世间大抵便是如此，正如那句感慨所言：“钟鸣鼎食之家，锦绣和齷齪，到底不是外人可以体会的。”外人只看见读书人的风雅光彩，却很难知晓其背后生活的困顿与委屈。

1979年的夏天，中考放榜，我距离中专录取分数线仅差2.7分。这份落空的期盼，让我满心低落。怀揣着失意的情绪，我走进野寨中学的校门，懒洋洋地走进了高一的教室。

开学第一节课是四十五分钟的数学课，因为心情沮丧，我完全无心听课。第二节课的上课铃声响起，语文老师迈步走上讲台。班长喊起立，全班同学齐刷刷站起身，老师微微抬头，和颜悦色，轻轻点头，待班长示意坐下，我们才纷纷落座。只见老师转过身，拿起粉笔在黑板写下“伐檀”二字，笔画粗细均匀，字体方正舒展，颇有柳公权书法的韵味。写完，他旋即转过身面向全班同学，抬起右手，模仿着斧头砍伐树木的姿态，富有节奏地模拟“砍”的动作，字正腔圆，高声诵读起课文。我抬起头，认真打量这位语文老师，他约莫四十岁上下，中等身材，脚上穿着黑色千层底布鞋，一身灰色长裤，搭配洁白的短袖衬衣，衣物干净得一尘不染。头颅端正，头发微微卷曲，一口牙齿洁白整齐，鼻梁上架着一副棕色边框的眼镜。一身典型的民国知识分子气质。

老师带领我们齐声朗读：坎坎伐檀兮，置之河之干兮……我们跟着反复诵读了三遍，老师逐字逐句翻译古文，细致讲解文章的时代背景。整堂课在老师诙谐生动的谈笑之间悄然落幕，所有同学都沉浸在古文描绘的场景之中，久久回味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没有遇见过这样妙趣横生的语文课，也从没想过晦涩

的古文可以讲得如此引人入胜。后来我们才慢慢懂得，并非古文本身多么浅显有趣，而是授课老师的学识与表达，赋予了文本鲜活的生命力。下课铃响，老师目不斜视，昂首挺胸大步离开教室，那道背影，连同《伐檀》这篇课文，就此在我的心底生根发芽。那课堂上反复诵读多遍的《伐檀》，全班同学几乎都可以终生熟记，这是我们共同的真切感受。

这位让我印象深刻的高一语文老师，便是孙昌瑞先生。在野中，高一时，孙昌瑞先生教我们的语文；到了高二，他改教我们的政治课。他上课很少固守在讲台中央，常常向前跨一步，站在讲台之下，距离第一排学生课桌五十公分左右的位置，身体微微侧立。这样的站位，让他可以一眼看清教室里每一位学生的神态，而我们也能够清清楚楚看见老师的神情手势。孙先生学识渊博，讲课风格诙谐风趣，搭配富有表现力却又内敛克制的手势与神态，不管是语文课还是政治课，都成为全班同学最期待的课程，课堂之上没有一个人走神开小差。冬日来临的时候，孙先生脖子上常常围着一围巾，或灰色，或天蓝色。这条围巾，更是为他本就儒雅的气质锦上添花，同样的饰物换作旁人，未必能够这般浑然天成。

等到我们这一批学生考上大学离开校园，1982年夏天，孙昌瑞先生也调任安庆行署教育局教研室，但我们依旧一直关注孙先生的动态，时常能够在《安徽文学》《散文》等知名文学刊物上读到他创作的小说与散文。他的文字文风质朴，意境悠远，立意高远，读完总能引人深思，获得启迪。

孙先生不止文学功底深厚，对于社会现实同样有着入木三分的观察，看待问题总能够穿透表象抓住本质。我还清晰记得，1987年夏天，我路过安庆，约孙先生喝茶闲谈，聊起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类现实难题。孙先生缓缓道出，当时中国社会最为深刻、也最难化解的有三大问题：农村问题、青年问题和干部问题。数十年的社会发展现实，恰恰印证了他当年的思考。2017年国庆，我邀约数位高中老同学，请孙先生小聚叙旧。席间众人

谈笑风生，气氛热闹，唯独孙先生沉默静坐，少有言语。一同赴约的姚先生便开口问道：“老孙怎么不说话呢？”孙昌瑞先生淡然作答：“我思，故我在。”一句话，尽显读书人的哲思风骨。

高二第一节语文课铃声响起，一位身材中等偏矮，看上去略显清瘦的老师走上讲台。我抬眼仔细打量，他身着四个口袋的藏青色中山装，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。班长喊起立，他目光缓缓扫过全班，轻声说道：“请坐下！”他的嗓音纤细，音量不高，可那个“请”字，我听得格外清晰。那一刻，我便在作业本上写下八个字：“道貌岸然”“谦谦君子”，这便是初见之时，我对这位新老师的第一印象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便尊称他为汪老师。

我的作文基础尚可，汪老师很快便注意到我，对我多有器重。晚自习乃至午休，我常去汪老师家中，请他点评作文，他常常牺牲休息时间为我辅导。一次命题作文《谈谈舍生取义与见利忘义》，我提出比较另类的辩证观点。课后他叫我去他的宿舍，我恰巧撞见他情绪激动，见到我后，他迅速平复心绪，认真评析我的文章，郑重告诫我：“人，要行大道，不要钻牛角尖。”

高考前两天，他再次提醒我作文立意要稳妥。1981年高考作文题为读《毁树容易种树难》，多数人写树人主题，我写“开国不易治国难”。我提前一小时交卷，看见汪老师正站在烈日下焦急等候。听完我的写作思路，他高兴得像个孩子。最终作文满分40分，我拿到36分。

汪南松老师在《三生集》中阐述他的教育理念：人是教学的中心，文学即“人学”，文章即“人章”；修辞要贴合题意情境，写作教学重在培养观察体验的动态能力；提倡教学民主，教师主导服务学生主体，教师也在教学中重塑自我。他始终把学生当作教育的目的，而非手段。他是那样说的，也是那样做的。

岁月流转，世事变迁，方雄飞老师、孙昌瑞老师都已作古。去年国庆，我前去探望汪南松老师，汪老师还频频提起他们两位，细数二人诸多可贵的闪光点。回望1980年代的野寨中学，一众文人师长，难得的是，他们文人相亲，互不轻视，彼此敬重，互相扶持。那一段峥嵘岁月，那些学识深厚、心怀仁爱的师长，是我一生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当我正要搁笔时，惊闻汪先生于本月21日8时与世长辞，我是泪水横流啊！

